

大中華文庫

漢日對照



大中華文庫

漢日對照

三國演義

三國志演義

I

大中华文库

汉日对照

大中華文庫

漢日对照

三国演义

三国志演義

I



罗贯中 著
井波律子 译

羅貫中 著
井波律子 訳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年初版

SANGOKUSHI ENGI

© Ritsuko Inami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正式授权，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版權所有。本著作物のいかなる部分（引用する専門家の評論を含まない）も発行者の書面での許可を得ずに複製すること、またはデジタル形式あるいはアナログ形式（既知あるいは今後発明されるもの）を含むいかなる形式で伝播することを禁じる。

ISBN 978 - 7 - 02 - 007182 - 1

©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年

発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100705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http://www.rw-cn.com>

中華人民共和国にて印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大 中 华 文 库

大 中 華 文 庫

学术顾问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往道 叶水夫 任继愈 刘重德
汤博文 李学勤 李赋宁 杨宪益
沙博理 张振玉 林茂荪 季羨林
金开诚 胡文仲 袁行霈 梁良兴
韩素音 戴文葆

总监纂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监纂: 蒋建国

副总监纂:

于友先 石宗源 刘 杲 杨牧之
金立群 周明伟 柳斌杰 蔡名照

工作委员会

主任: 杨牧之

副主任: 黄友义 李 岩 尹飞舟
吴尚之 徐 步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杨宝 庄智象 刘国玉 刘周远
孙亚飞 李 峰 李成权 李朋义
李艳辉 何林夏 张高里 张海鸥
陈万雄 易言者 金英伟 荆孝敏
胡开敏 贺耀敏 袁依山 顾爱彬
徐 俊 殷忠民 黄 松 黄凤显
龚 莉 梁文花 游道勤 谢清风
蔡剑峰 管士光

编辑委员会

总编辑: 杨牧之

副总编辑: 黄友义 马欣来 尹飞舟
王家新 徐明强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胡开敏 (兼) 黄 松 (兼)
张若楷

學術顧問委員會:

丁往道 葉水夫 任繼愈 劉重德
湯博文 李學勤 李賦寧 楊憲益
沙博理 張振玉 林茂蓀 季羨林
金開誠 胡文仲 袁行霈 梁良興
韓素音 戴文葆

監修委員會:

監修委員長: 蒋建国

副監修委員長:

于友先 石宗源 劉 杲 楊牧之
金立群 周明偉 柳斌傑 蔡名照

工作委員會:

主任: 楊牧之

副主任: 黃友義 李 岩 尹飛舟
吳尚之 徐 步

委員:

王楊寶 莊智象 劉國玉 劉周遠
孫亞飛 李 峰 李成權 李朋義
李艷輝 何林夏 張高里 張海鷗
陳萬雄 易言者 金英偉 荊孝敏
胡開敏 賀耀敏 袁依山 顧愛彬
徐 俊 殷忠民 黃 松 黃鳳顯
龔 莉 梁文花 游道勤 謝清風
蔡劍峰 管士光

編集委員會:

總編集長: 楊牧之

副總編集長: 黃友義 馬欣來 尹飛舟
王家新 徐明強

工作委員會辦公室:

胡開敏 (兼任) 黃 松 (兼任)
張若楷



总 序

杨牧之

《大中华文库》终于出版了。我们为之高兴，为之鼓舞，但也倍感压力。

当此之际，我们愿将郁积在我们心底的话，向读者倾诉。

—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系统、准确地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翻译成外文，编辑出版，介绍给全世界，是几代中国人的愿望。早在几十年前，西方一位学者翻译《红楼梦》，将书名译成《一个红楼上的梦》，将林黛玉译为“黑色的玉”。我们一方面对外国学者将中国的名著介绍到世界上去表示由衷的感谢，一方面为祖国的名著还不被完全认识，甚至受到曲解，而感到深深的遗憾。还有西方学者翻译《金瓶梅》，专门摘选其中自然主义描述最为突出的篇章加以译介。一时间，西方学者好像发现了奇迹，掀起了《金瓶梅》热，说中国是“性开放的源头”，公开地在报刊上鼓吹中国要“发扬开放之传统”。还有许多资深、友善的汉学家译介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在把中华民族文化介绍给全世界的工作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或囿于理解有误，或缘于对中国文字认识的局限，质量上乘的并不多，常常是隔靴搔痒，说不到点子上。大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有最完备的国史。但他认



为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还处在哲学史前状态。这么了不起的哲学家竟然作出这样大失水准的评论，何其不幸。正如任何哲学家都要受时间、地点、条件的制约一样，黑格尔也离不开这一规律。当时他也只能从上述水平的汉学家译过去的文字去分析、理解，所以，黑格尔先生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水平是什么状态，也就不难想象了。

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缺少不了中国。中国文化摄取外域的新成分，丰富了自己，又以自己的新成就输送给别人，贡献于世界。从公元5世纪开始到公元15世纪，大约有一千多年，中国走在世界的前列。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她的光辉煌耀全世界。人类要前进，怎么能不全面认识中国，怎么能不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呢？

二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曾经辉煌过，蓝天、白云、阳光灿烂，和平而兴旺；也有过黑暗的、想起来就让人战栗的日子，但中华民族从来是充满理想，不断追求，不断学习，渴望和平与友谊的。

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曾经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的话就是要人们向别人学习。这段话正是概括了整个中华民族与人交往的原则。人与人之间交往如此，在与周边的国家交往中也是如此。

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可惜在位只有十几年，来不及做更多的事情。汉朝继秦而继续强大，便开始走出去，了解自己周边的世界。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



他帶着一萬頭牛羊，總值一萬萬錢的金帛貨物，作為禮物，開始西行，最遠到過“安息”（即波斯）。公元73年，班超又率36人出使西域。36個人按今天的話說，也有一個排，顯然是為了拜訪未曾見過面的鄰居，是去交朋友。到了西域，班超派遣甘英作為使者繼續西行，往更遠處的大秦國（即羅馬）去訪問，“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後漢書·西域傳》）。“條支”在“安息”以西，即今天的伊拉克、敘利亞一帶，“西海”應是今天的地中海。也就是說甘英已經到達地中海邊上，與羅馬帝國隔海相望，“臨大海欲渡”，却被人勸阻而未成行，這在歷史上留下了遺恨。可以想見班超、甘英溝通友誼的無比勇氣和強烈願望。接下來是唐代的玄奘，歷經千難萬險，到“西天”印度取經，帶回了南亞國家的古老文化。歸國後，他把帶回的佛教經典組織人翻譯，到後來很多經典印度失傳了，但中國卻保存完好，以至於今天，沒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印度人很難編寫印度古代史。明代鄭和“七下西洋”，把中華文化傳到東南亞一帶。鴉片戰爭以後，一代又一代先進的中國人，為了振興中華，又前赴後繼，向西方國家學習先進的科學思想和文明成果。這中間有我們的國家領導人朱德、周恩來、鄧小平；有許許多多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如郭沫若、李四光、錢學森、冼星海、徐悲鴻等。他們的追求、奮鬥，他們的博大胸懷，兼收並蓄的精神，為人類社會增添了光彩。

中國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就是一個以眾為師、以各國人民為師，不斷學習和創造的過程。中華民族曾經向周邊國家和民族學習過許多東西，假如沒有這些學習，中華民族絕不可能創造出昔日的輝煌。回顧歷史，我們怎麼能夠不對偉大的古埃及文明、古希臘文明、古印度文明满怀深深的感



激？怎么能够不对伟大的欧洲文明、非洲文明、美洲文明、澳洲文明，以及中国周围的亚洲文明充满温情与敬意？

中华民族为人类社会曾经作出过独特的贡献。在15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遥遥领先的地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说：“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大国的兴衰》的作者保罗·肯尼迪坦言：“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

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千里迢迢来中国观光、学习。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唐朝的长安城渐渐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西方的波斯、东罗马，东亚的高丽、新罗、百济、南天竺、北天竺，频繁前来。外国的王侯、留学生，在长安供职的外国官员，商贾、乐工和舞士，总有几十个国家，几万人之多。日本派出的“遣唐使”更是一批接—批。传为美谈的日本人阿部仲麻吕（晁衡）在长安留学的故事，很能说明外国人与中国的交往。晁衡学成仕于唐朝，前后历时五十余年。晁衡与中国的知识分子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归国时，传说在海中遇难身亡。大诗人李白作诗哭悼：“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晁衡遇险是误传，但由此可见中外学者之间在中国长安交往的情谊。

后来，不断有外国人到中国来探寻秘密，所见所闻，常常让他们目瞪口呆。《希腊纪事》（希腊人波桑尼阿著）记载公元2世纪时，希腊人在中国的见闻。书中写道：“赛里斯人用小米和青芦喂—种类似蜘蛛的昆虫，喂到第五年，虫肚子胀裂开，便从里面取出丝来。”从这段对中国古代养蚕技术的描述，可见当时欧洲人与中国人的差距。公元9世纪中叶，阿拉伯人来到中国。—位阿拉伯作家在他所著的《中国印度



闻见录》中记载了曾旅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的见闻：

——一天，一个外商去拜见驻守广州的中国官吏。会见时，外商总盯着官吏的胸部，官吏很奇怪，便问：“你好像总盯着我的胸，这是怎么回事？”那位外商回答说：“透过你穿的丝绸衣服，我隐约看到你胸口上长着一个黑痣，这是什么丝绸，我感到十分惊奇。”官吏听后，失声大笑，伸出胳膊，说：“请你数数吧，看我穿了几件衣服。”那商人数过，竟然穿了五件之多，黑痣正是透过这五层丝绸衣服显现出来的。外商惊得目瞪口呆，官吏说：“我穿的丝绸还不算是最好的，总督穿的要更精美。”

——书中关于茶（他们叫干草叶子）的记载，可见阿拉伯国家当时还没有喝茶的习惯。书中记述：“中国国王本人的收入主要靠盐税和泡开水喝的一种干草税。在各个城市里，这种干草叶售价都很高，中国人称这种草叶叫‘茶’，这种干草叶比苜蓿的叶子还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开水冲喝，治百病。”

——他们对中国的医疗条件十分羡慕，书中记载道：“中国人医疗条件很好，穷人可以从国库中得到药费。”还说：“城市里，很多地方立一石碑，高10肘，上面刻有各种疾病和药物，写明某种病用某种药医治。”

——关于当时中国的京城，书中作了生动的描述：中国的京城很大，人口众多，一条宽阔的长街把全城分为两半，大街右边的东区，住着皇帝、宰相、禁军及皇家的总管、奴婢。在这个区域，沿街开凿了小河，流水潺潺；路旁，葱茏的树木整然有序，一幢幢宅邸鳞次栉比。大街左边的西区，住着庶民和商人。这里有货栈和商店，每当清晨，人们可以看到，皇室的总管、宫廷的仆役，或骑马或步行，到这里来采购。



此后的史籍对西人来华的记载，渐渐多了起来。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尽管有人对他是否真的到过中国持怀疑态度，但他留下一部记述元代事件的《马可·波罗游记》却是确凿无疑的。这部游记中的一些关于当时中国的描述使得西方人认为是“天方夜谭”。总之，从中西文化交流史来说，这以前的时期还是一个想象和臆测的时代，相互之间充满了好奇与幻想。

从16世纪末开始，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东西方航路的开通，随着一批批传教士来华，中国与西方开始了直接的交流。沟通中西的使命在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那里有了充分的体现。利玛窦于1582年来华，1610年病逝于北京，在华二十余年。他把科学作为传教的工具，激起中国一些读书人对西方科学的兴趣。除了传教以外，他还做了两件具有历史象征意义的事，一是1594年前后在韶州用拉丁文翻译《四书》，并作了注释；二是与明代学者徐光启合作，用中文翻译了《几何原本》。

西方传教士对《四书》等中国经典的粗略翻译，以及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等书对中国的介绍，在西方读者的眼前展现了一个异域文明，在当时及稍后一段时期引起了一场“中国热”，许多西方大思想家都曾注目于中国文化。有的推崇中华文明，如莱布尼兹、伏尔泰、魁奈等，有的对中华文明持批评态度，如孟德斯鸠、黑格尔等。莱布尼兹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某些思想与他的观念相近，如周易的卦象与他发明的二进制相契合，对中国文化给予了热情的礼赞；黑格尔则从他整个哲学体系的推演出发，认为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还处在哲学史前的状态。但是，不论是推崇还是批评，是吸纳还是排斥，都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随着先进的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特别是中国的造纸、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四大发明的问世，大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马克思说：“中国的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英国的哲学家培根说：中国的四大发明“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和一切事物的状态”。

三

大千世界，潮起潮落。云散云聚，万象更新。中国古代产生了无数伟大的科学家：祖冲之、李时珍、孙思邈、张衡、沈括、毕昇……产生了无数科技成果：《齐民要术》、《九章算术》、《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以及保存至今的世界奇迹：浑天仪、地动仪、都江堰、敦煌石窟、大运河、万里长城……但从15世纪下半叶起，风水似乎从东方转到了西方，落后的欧洲只经过400年便成为世界瞩目的文明中心。英国的牛顿、波兰的哥白尼、德国的伦琴、法国的居里、德国的爱因斯坦、意大利的伽利略、俄国的门捷列夫、美国的费米和爱迪生……光芒四射，令人敬仰。

中华民族开始思考了。潮起潮落究竟是什么原因？中国人发明的火药，传到欧洲，转眼之间反成为欧洲列强轰击中国大门的炮弹，又是因为什么？

鸦片战争终于催醒了中国人沉睡的迷梦，最先“睁眼看世界”的一代精英林则徐、魏源迈出了威武雄壮的一步。曾国藩、李鸿章搞起了洋务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喊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中国是落后了，中国的志士仁人在苦苦



探索。但落后中饱含着变革的动力，探索中孕育着崛起的希望。“向科学进军”，中华民族终于又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今天，世界已经跨入21世纪。分散隔绝的世界，逐渐变成联系为一体的世界。现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当今，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对其它优秀文化的汲取，都以其它优秀文化的发展为前提。在近现代，西方文化汲取中国文化，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传播，更是西方文化自身的创新和发展；正如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汲取一样，既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在近代的转型和发展。地球上所有的人类文化，都是我们共同的宝贵遗产。既然我们生活的各个大陆，在地球史上曾经是连成一气的“泛大陆”，或者说是一个完整的“地球村”，那么，我们同样可以在这个以知识和学习为特征的网络时代，走上相互学习、共同发展的大路，建设和开拓我们人类崭新的“地球村”。

西学仍在东渐，中学也将西传。各国人民的优秀文化正日益迅速地为中国文化所汲取，而无论西方和东方，也都需要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养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组织出版汉英、汉法、汉西、汉俄、汉阿、汉德、汉日和汉韩等对照版《大中华文库》，以九种文字，全面系统地翻译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我们试图通过《大中华文库》，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追求，五千年的梦想，正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放光芒。中国人民就像火后的凤凰，万众一心，迎接新世纪文明的太阳。

1999年8月《大中华文库》付印前

2008年9月多语种文版付印时修改



総論

『大中華文庫』がついに出版の運びとなった。われわれは大変うれしくまた元気づけられているが、同時にひとしお強い重圧を感じている。

この際、われわれの心の底の鬱積を、腹藏なく読者に吐露したいと思う。

—

中華民族は悠久の歴史と輝かしい文化を有している。われわれは長年、中華民族の文化の古書籍を系統だつて正確に外国語に翻訳し、編集出版し、全世界に紹介したいと願ってきた。早くも数十年前に、ヨーロッパのある学者が『紅樓夢』の翻訳に取り組み、書名を『紅い樓閣の夢』、林黛玉を「黒の玉」と訳しているが、われわれは外国の学者が中国の名著を世界に紹介することに感謝する一方で、祖国の名著が十分に理解されなかったり、ひどい場合は曲解されていることを大変遺憾に思ってきた。また『金瓶梅』を翻訳したヨーロッパのある学者は、本に仕立てようと、もっぱら作品中の最も目立った自然主義的な描写を抜粋して翻訳して差しはさんだ。一時期、ヨーロッパの学者はまるで奇跡を発見したように『金瓶梅』旋風を巻き起こし、中国は「性の開放のルー



ツ」であると吹聴し、新聞や雑誌で中国は「開放の伝統を発揚」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と大いにもてはやした。さらには多くの学識のある親善的なシノロジストが中国の古代哲学著作を翻訳し、中華民族の文化を世界中に紹介する仕事で大きな貢献をしたが、それらは必ずしも正しい理解がなされていなかったり、あるいは漢字理解の限界から質的に上々と言えるものが少なく、いつも隔靴搔痒で的を射たものではなかった。大哲学者のヘーゲルはかつて、中国には最も整った国史はあるが、中国古代には真の意味での哲学はなく、なお哲学の史前状態である、と言っている。ヘーゲルのようなすばらしい哲学者が最終的にこのような間違っただけの評価を下すとは、まったく何という残念なことか。如何なる哲学者も、みな時間、場所、条件などの制約を同じように受けなければならず、ヘーゲルもまたその例外ではなかった。当時はヘーゲルも上述のようなレベルのシノロジストたちが翻訳した文字を分析して理解するしかなく、ヘーゲルの中国古代社会に対する認識レベルがどんなレベルであったかは想像に難くないだろう。

中国は世界と切り離せず、世界も中国無しには成り立たない。中国文化は外部の新しい要素を吸収して自らを豊かにし、また自己の新しい成果を他者に送り込むことによって、世界に貢献してきた。西暦5世紀から15世紀までの約1000年余りの間、中国は世界の前列にあった。この1000年余りの時間の中に、中国はその輝きを世界に降り撒いた。人類は前進するものであり、人々は必ずや中国を全面的に理解し、まじめに中国の歴史を研究するだろう。



二

中華民族は偉大であり、かつては青空に白雲が浮かび陽光がさんさんと降り注ぐように、平和で大いに栄えていた。暗雲が立ち込めて、思いだせば戦慄するような日々もあったが、中華民族はずっと理想に燃え、追求を止めず、学習を続け、平和と友誼を渴望し続けてきた。

中国古代の偉大な思想家である孔子は、かつて「われ三人行えば、必ずわが師を得。その善き者を選びてこれに従う。その善からざる者にしてこれを改む」と説いている。孔子の話は人が他人に学ぶべきことを説いているのである。この話はまさにすべての中華民族と人の交流の原則を総括したものといえよう。人と人の間の交流はこ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り、周辺の国家との行き来もこ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る。

最初に中国を統一した秦の始皇帝は、惜しむらくは十数年しか在位せず、あまりたくさんの仕事をする事ができなかった。引き継いだ漢王朝は引き続き強大化を図り、外へ出て行き始め、自分の周辺の世界を認識した。漢の武帝は紀元前138年、張騫を西域に遣いとして派遣した。彼は一万頭の牛と羊、多額の金や絹織物をみやげとして携えて西へ進み、最も遠くは安息（ペルシャ。今のイラン）まで出かけて行った。西暦73年、班超は36人を率いて西域に出かけた。36人は今で言えば一小隊にすぎず、今まで出会ったことのない隣人を訪ね、交友するためのものであったことが分かる。西域に着くと班超は甘英を使者としてさらに西へ向かわせ、は



るか遠い大秦国（ローマ）を訪問させた。甘英は安息を経て「条支（古代西域の国名）に至り、西海に臨みもって大秦を望んだ」（『後漢書・西域伝』）。「条支」は「安息」以西にあり、今日のイラク、シリア一带に相当し、「西海」とは今日の地中海のことである。つまり甘英はすでに地中海のほとりまで到達し、ローマ帝国と海を隔てて相まみえ、「大海に臨んで渡らんと欲した」のだが、人に阻まれて果たせなかったのである。これが歴史的な遺恨となった。これらにより班超、甘英が繋いだ交流への比類なき勇気と強烈な願望を見て取ることができる。続いて唐代の玄奘は万難を排して、「西天」のインドに仏典を取りに行き、南アジア諸国の古い文化を中国へもたらした。帰国後、彼は持ち帰った仏典を人を集めて翻訳した。後にインドではほとんどの経典が失われたが、中国には完全な形で保存された。今に至るも玄奘の『大唐西域記』がなければ、インド人はインド古代史を編纂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ほどである。明代には鄭和が「7つの西の洋を下り」中華文化を東南アジア一带へ広めた。アヘン戦争後、中華を振興させるために、先進的な中国人は次から次へと西方国家から先進的な科学思想や文明成果を学んだ。その中にはわが国の朱徳、周恩来、鄧小平などの指導者、郭沫若、李四光、銭学森、冼星海、徐悲鴻などの科学者や文学者、芸術家がいる。彼らの追求と奮闘、彼らの胸に抱かれた大きな夢、蓄えられた精神は、人類社会のためにすばらしい彩を添えた。

中国文化の形成と発展過程は、大衆を師とし、各国の人民